

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传

陈 吉 龙

少时受教于父母师友

吕思勉，字诚之，笔名有程芸、弩牛等。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1884年2月27日出生在十子街六号（今新生里八号）吕氏旧宅。吕氏旧宅位于“诗情画意两相兼”的白云溪北侧，是个风景秀丽，人文荟萃之地。吕氏家族也是一个“世代仕宦”，以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高祖、曾祖均是举人，祖父吕懋先（字晋廷）是国学生，曾知江西奉新县事。父亲吕德骥（字誉千），少有文名，为学悖笃，补县学生，食廩饩，而后科场失意，十应乡试不售，晚乃选授江浦县学教谕。服膺经训，曾号所居“抱遗经室”。后好言经世，喜读史书，著有《抱遗经室读书随记》及诗集若干卷。母亲程棣（字仲芬），武进名士程兆缙之次女，小时避难江西，转徙兵间，仅读《论语》二十篇，《孟子》读至齐桓晋文之事章即辍学，后自学经史古籍，亦能诗文，有《逸秋诗钞》、《读书随笔》各一卷。这样的家庭对子弟的教育是很关注的。他四岁时，父母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外曾祖父早逝，因居官清廉，外曾祖母带着四个儿子回常，苦度岁月，甚是贫困。一日天雨墙倒，外曾祖母只得自行修葺，在墙根下获得黄金一器，外曾祖母认为这是非份之财，不能据为己有，仍掩埋于原处。这个故事，给他的印象极深，他因此终生不苟取一文。后来还曾将这故事讲给他女儿

听，希望廉洁成为家风。

他父亲认为，古者易子而教，有一定理由，因为做父母的，往往容易因溺爱子女而失之宽纵，或因期望太切而失之过严。他六岁时，家里就请了同邑的薛念辛先生为蒙师。从此“诵读四子书，日授十行，行十七字。”开始了读经，学八股文的生涯。八岁起开始与史学发生关系，启蒙者是程棣夫人，她讲解的第一部史书是“《纲鉴正史约编》”。母亲没空时，就由姊姊永萱（字颂宜）辅导。讲到楚汉之际，先生便自己阅读，每天读几页，读到唐初。翌年，父亲选授江浦县学教谕，蒙师薛先生到扬州做官去了，便随魏少泉先生读书，魏先生命点读《纲鉴易知录》，书未读完，魏先生又走了。后因家庭经济拮据，无力延师，他父亲就亲自讲授，母亲、姊姊从旁协助讲解。他从头至尾点读完了《纲鉴易知录》后，又花了半年时间，按族兄少木先生的要求，点读了编年体通史《通鉴辑览》，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在此同时，母亲还给他讲了大徐本《说文解字》。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先生十一岁，已开始读报，关心时事。翌年，战争失败。国蹙师烬，痛深创巨，海内知识分子群起而谋改革。1896年，梁启超在沪主笔《时务报》，他以通俗流畅，气势恢宏的时论，系统地宣传变法理论，明确提出中国要变法图强，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该报也成了他案头上必读的刊物，后来除《清议报》因当时传递禁严未能全部阅读外，凡梁启超的文章，无不寓目。他留心摘录过的报刊还有《中外日报》、《新闻报》、《天津大公报》、《同文沪报》等。后来又阅读了《五洲列国志》、《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普法战争》、《日本国志》等书。不仅学习了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知识，而且对东西方各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政体、科学文化和经济发展也有了初步了解。十四岁时，又随全家自江浦回归故里。

1898年戊戌变法，在思想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康有为、梁启超一时成了风云际会的人物，也成了他心目中的楷模。这时除了阅读梁启超的各种文章外，还先后读了康有为的《上书记》、《新学伪经考》等著作，思想上受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故乡是清代今文经学派发轫地，他对常州学派代表人物庄存与、刘逢禄的著作也多有接触。幼年读过陶渊明《桃花源记》和《礼记·礼运》中对大同世界的描述，所以他不独希望世界大同，也确信世界大同可以达到。“这种见解实植根于髫年读康先生的著作时”。

遍读二十四史

他十五岁开始阅读正史。先读《史记》，按照归方的评点本用五色笔照录一次，后来又在亲戚处借得《前汉书》、《后汉书》评点本，仍照录一遍，接着又将《三国志》点读完毕。1899年考入阳湖县学后，遵父亲的嘱咐，“要多读书，不该兢兢于文字之末。”开始读《通鉴》、《续通鉴》和陈克家的《明纪》。这时读书认真，兴致很高，每读一书，都能从头到尾看完。一天能看十四卷，速度惊人。但读了后，不甚理解。为此，曾请教前辈，回答说，“初读书时，总是如此，读书是要自己读出门径来的，你读过两三千卷书，自然觉得自己有把握，有门径。初读书时，你须记得曾文正公家书里的话，读书如略地，但求其速，勿求其精。”话虽如此说，先生读书还是非常认真的，在先生的遗稿中，尚保存有幼时的史札一本、读《通鉴》札记论九本、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札记六本。史论上还留有当年其父师批改圈点的手笔。在此同时，还读了《古文辞类纂》和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打下了阅读古文的基础。十六七岁间，其父按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教子弟读书的常用办法，要他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读一遍，以便在做学问之初，可知整个学问的概况及分类，知

道天下学问有哪几种，每种之源流派别如何，重要的书有哪些，对学术史作一鸟瞰。他对这部书学得很认真，化了二年多时间，将经、史、子三部全部读完，只是集部读了一半。在父亲的指导下，又阅读了《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等书，着重学习怎样阅读史书及写作札记的方法。他对这两部书特别看重，日后曾说：“……前者贯串群书，并及于身所经验的事实；后者专就正史之中，提要钩玄，组织之以发明湮晦的事实真相，都为现在治史学的好模范”。十七岁时，与表兄管联第（字达如）相见。联第是同邑著名的历史舆地学家谢钟英的弟子，因此也认识了钟英先生的儿子后来主编《中国医学大辞典》的谢观（字利恒）先生。三人经常在一起，因而听到不少关于钟英先生的学问和议论。钟英先生以考证著名，尤长于地理，曾著有《三国疆域志补》。然先生感兴趣的则不是考证，而是对世事的观察分析能力。他受到影响，后来读史治学，常将历史上的事实和现实联系起来，互相比照，而不被表面的记载所局限。他还从管联第口中，得知钟英先生好言治道以及崇信法家及纵横家的学说。他并不信纵横家，只服膺法家中的“术家”，“以为凡事皆藉政治之力改良之，然政治上的弊病，则由于执政者的自利。”因此，“术家精义，在于臣主异利。”他希望出现一个“大公无私者”的君主，站在最高之地位对群臣进行任免、考核、赏罚，以此改善政治，为走向大同第一步。后来他常说：“法允当务之急也。”还认为“欲治中国，信罚必赏，开功名之路，绝缴幸之门，三言而已。”这时他转而笃信法家。

未几，他又认识了经学名家丁桂征先生。丁先生是他的堂房姨丈，对小学非常精熟。每问一字，随手可从《说文》或《说文》以后的字书中检出，比一般人查字典还快。有一天，他做了一篇经学上的考据文字去请教丁先生，丁先生指出了他对于经学上的许多外行之处，因而告诫说，“欲求学问，必多读书，欲读

古书，必先识字，勸以精研训诂，植为学之基。……”并劝他读《段注说文》、《十三经注疏》。他以后又花了三四年功夫，将有关小学的书，及《十三经注疏》精读一遍，使经学、文字学成为治史的得力工具。

他生平未进学校，对于新科学，仅向徐点撰、庄伯行两先生学过些数学等。与当时的读书人一样，是入“经济之学”一路的，因此经常翻阅《经世文编》一类书，只是苦于掌故源流不甚明白。十八岁时，他的姨丈管元善（管联第父亲）先生和汤蛰仙先生同事，劝他阅读汤著的《三通考辑要》。读了一两卷后，得益甚多，于是又求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原本和《三通考辑要》对读，后来干脆舍汤本而读原本，接着又把杜佑的《通典》和《文献通考》对读。还读了郑樵的《通志》二十略、《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

1904年，二十一岁时，与虞菱（字縑兰）女士结婚。同年邑人于定一（字瑾怀）、庄俞（字百俞）、刘志扬等创风气之先，赁屋于铁市巷岳宅，创设“读书阅报社”，除供阅书报外，还常邀请学者讲学。翌年，曾任京师大学堂、奉天大学堂正教习的元史专家屠寄（字敬山）返里小住时，被邀往读书阅报社讲元史。他亦欣然前往听讲。屠先生讲课不挟一书，口讲手划，滔滔不绝，声音清宏，持久不疲，举凡政治、制度、人物、疆域、物产，靡不烂熟于胸，而时有新义妙论，使人乐而忘返。在屠先生的影响下，他开始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问题的研究。那时正值二十三岁，首次读遍了二十四史。

他“论政治利弊，好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且性好考证；遂逐渐走入史学一路。”从那时起，以阅读二十四史为日课，“专意治史矣。”他的治学基本上是沿用乾嘉学者的方法，博览群籍，精熟史书，然后将史料进行钩稽排比，综合考校，相互参证，酿成新说。每读书必用朱笔圈识，也常用庄书小楷眉

批，或将材料抄录，加题识或按语，分类保存，在此基础上写成读书笔记。待有心得，意见成熟，即写成札记、论文或专著。如此五十年如一日，形成了先生扎实的治学功力及精切严谨的学风和文风。一部二十四史，三千二百三十九卷，究竟读过几遍，众说纷纭。他1941年曾说：“我于四史，《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得最多，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二遍而已。”这是五十八岁时讲的。后来，他又陆续撰写了《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以及大量的史学札记，焉知他又读了几遍呢？

执教于常、苏、沪、沈

1905年他应常州溪山小学堂创办人朱少堂之聘，执教于该学堂。1907年二十四岁时，由沈问梅先生介绍，赴苏州教会学校东吴大学教国文历史，因气味不投，至暑假即辞去。同年11月15日，常州知府许星璧与士绅恽祖祁等人创设“常州府中学堂”，首任监督（即校长）日本留学生、同盟会会员屠宽（字元博）聘请先生任史地教员。在校二年又二个月，深受师生爱戴。著名学者钱穆先生在八十岁时回忆当年受业时写道，“当时常州府中学堂诸师长尤为余毕生难忘者，有吕思勉、诚之师。……诚之师不修边幅，上堂后，尽在讲台上来往行走，口中娓娓不断，但绝无一言半句闲言旁句驕人，而时有鸿义创论，同学争相推敬。”钱穆还讲了吕先生批阅他考卷的故事。一次考试有四题，他尤喜其中一题。下笔后竟不能停笔，因时间到，只答了一题。后他与数位同学在窗外悄悄地偷看先生批卷，先生恰好在评阅他的试卷，阅毕在卷后加批语，一纸加一纸，竟也无休止，后来给试卷打了75分。从中也可见他平日教学、为人及其日常生活之一斑。

1910年，屠宽的父亲屠敬山在南通主持张謇（字季直）创办

的南通国文专修馆，培养办理公文的人才，邀请他去帮忙。他便到南通任教授。1912年，又接受杨秉铨先生的延聘，在上海商学公会办的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堂教应用文字，并教商业地理、商业经济。因无教科书，他就边参阅日文书，边讲授。当时同校执教的还有平海澜先生和赵元任的堂兄赵元成（字敬谋），相处融洽，常有诗文酬唱。因商学公会会员对办校的意见分歧，于1914年暑假停办。同年七月由沈颐（字朵山）介绍进中华书局当编辑。1915年在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杂志第一卷第十一期上用轻根的笔名发表了《蒙古种族考》，可说是关于民族史方面的最早论文。还写了两本通俗史书《苏秦张仪》和《国耻小史》，后者至1936年竟出至24版。因在书局专事编辑教科书、参考书的工作，感到乏味，很想远游。1918年秋，先生的表姊夫杨成能（字星岑）介绍他去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于是辞去了中华书局的职务。后因沈阳高师草创未久，人事未定，远游未能成行。而当时谢观正在商务印书馆主编中国医药大辞典，极欲求成。他因舅家世代知医，自幼耳目濡染，对于中国医书之源流派别颇熟，便应谢观之约进商务印书馆。谢即将辞典的一小部分稿件请先生襄理，至翌年暑假编毕。后由吴研因先生介绍，又去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了一学期国文。

1919年冬，沈阳高师仍来延聘，乃于1920年初到沈阳。不久，他深感此间专制守旧，便提倡学生阅读新杂志书籍，认为“生今之世，总不容不了解今人之思想，”并专门安排课时让学生阅读。他还提倡写实文学，要求作文必先有思想，虽用白话文，亦切忌用上层社会的思想去臆度描写下层社会的思想，提倡“文言的白话化”，“贵族文学平民化”。同时“以口语为基础，但亦应自行修辞……，二者同时并进，并参用外国语，如是者，旁薄郁积，万流齐汇，及其结果，而新文学出焉。”他写信给南方的友人表示：“高等师范究为三省最高之学校，弟颇愿潜

布革新之种子于数十青年之心中，辗转流布，必有数人受其影响者……”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写了《沈游通讯》、《南归杂记》、《〈一个不幸娘们〉的跋语》等，反对迷信，提倡科学，主张男女平等，向往民主自由。

同时，他还注意从西方不断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新的研究方法。经常阅读的杂志有《东方》、《太平洋》、《建设》、《改造》、《新潮》、《海潮音》等，并且积极地投身到重大的史学讨论中去。

二十年代是我国史学发展的鼎盛时期，1920年《建设杂志》展开中国古代有无井田制的辩论，第一次拉开了采用新观点新方法进行辩论的帷幕。众多名流学者纷纷加入论战，胡适提出了否定井田制存在的主张，认为这是孟子“托古改制”的一种乌托邦思想；胡汉民认为这是土地私有制未发生前的公产制度；廖仲恺则以为是土地公有制转化为私有制后的一种残余。先生则发表了《致廖仲恺、朱执信论学公开信》，又名《论货币与井田》，长达万言，从方法论上反驳了胡适否定井田制存在的论点，认为只要在考核史料的基础上，依照“社会历史变迁进化”的观点，作出合理新解释，就符合历史真实。

同年12月，他积十余年教学的经验 and 研究成果，写就《白话本国史》，于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史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长期被用作大学的教科书和青年“自修适用”的读物。杨宽先生曾回忆说，“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陈守实先生和我同在广东省立勸勤大学教育学院文史系（当时迁移在梧州的广西大学内）教书，陈先生上的中国通史课，还是用《白话本国史》作为教本的……”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对这部通史作了高度评价，说“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

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他在这部通史中，提出了不少有识见的观点：认为春秋战国是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的“大变迁”时期，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变革的“一大界限”；提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是因为“生产方法和生产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的缘故”；强调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称之为“朝”；以及把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最近世”、“现代”六个时期的结论，对史学界都有很大影响。该书已收入上海书店影印的《民国丛书》第二编。《白话本国史》的出版奠定了先生在史学界和学术界的地位。

1923年，应校长王饮鹤聘，赴江苏第一师范学校执教。在该校期间，他先后写成有关文字的著作四种。此外还编写了文学史讲义、群经概论、国文讲义等。

进入光华大学

1925年，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纷起抗议帝国主义者的暴行。此时，圣约翰大学暨附属中学的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的工人，举行罢课，并在校内下半旗志哀，以示对帝国主义的抗议。美籍校长卜芳济竟然蛮横无理地将当时的国旗拉下，踩在地上。于是学生553人，教员19人愤而离校，并谋创办光华大学。张寿镛先生任校长，知名学者如钱基博、张韵海、容启兆、颜任光、胡适、徐志摩、朱公谨、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廖茂如等，激于爱国热忱，纷纷来光华执教。当时他已应沪江大学之聘，教授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字学等课程。但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应光华国文系主任童伯章（斐）的邀请，赴光华任教。实实在在地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从此，几与光华终生相伴（1942年光华沪校停

办，曾回常执教、著述三年），直至解放后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

他进光华后，初任国文系教授，后历史系设立，即延为主任。每周上课十多个课时，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先秦学术概论、宋明理学、经子解题、史籍研究法及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的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的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讲课富有魅力，很多受业的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用浅近的文言文，以刚劲挺拔的书法，写上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引经据典，脱口而出。每个学生都发有讲义，仅为学生掌握系统知识和预、复习所用。而此种讲义，通过反复教学实践及几经修改后，往往就成为先生的著作。讲课时常以某一书、某一专题重点讲解，并结合最新治学体会大加发挥。当年曾受业于他的著名学者钱穆、杨宽、黄永年、叶百丰等先生均有切身之感。同时，他还常利用星期日上午，和一些学生、朋友聚集在一些僻静的茶室里随便谈论学问，将这里视为第二课堂。他们或交流学习心得体会，或提出某个有争论的或疑难的问题进行探讨。他常发表议论，侃侃而谈，循循善诱，成为推进学术研究和提携后进的主要方法。

他对学生的考核也别具一格，富有特色。下面录其一组试题，可见之一端。

中国通史乙组试卷

原妓

习惯、法律，对于离婚往往加以禁阻。其故安在？其得失若何？

或谓社群制度为女子之友，家庭制度为女子之敌，其说若何？

试述女系氏族易为男系之由。

宗法之制，所联络之人，血缘关系实多疏远，何以仍有亲爱之情？

试述氏族崩溃，家庭代兴之故。

古以多男为福，谚称养儿防老。然实际上，现代父母欲得其子孝养甚难，试就经济制度，剖析其故。

齐有巫儿之制，本以女主祭祀，然后世宗祧继承，必专于男，其故安在？

或谓今人之姓，实为无用之长物，仅因习惯而存在，其说然欤？

右九题，作一题即可完卷，九题全作，亦无不可，总之多少不拘，能勿抄录原文最佳，见解与讲义不同，或相反背，均无不可。

除了担任教学工作外，他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上。他不喜欢交际，曾说：“予生平不喜访问知名之士，人颇有愿下交者，亦多谢绝之，以泛泛访问，无益于学问修养也”。他在《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一文中认为“亲炙某种人物，对于道德、事功，是很有裨益的，因为这不是纸上的事，能与之居，或见其人，其获益自较徒读其书为大。若学问则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精深之理，繁复之事，岂能得之于立谈之间？若文章之妙，则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更与见面不见面无关了。”

在光华期间，他出版的历史著作有十余种，史学论文、札记数以百计。重要著作有：

《先秦史》 该书在选择重点和分析问题上有其慧眼卓识。如用一系列重大政治斗争贯串整个先秦政治史。抓住“辈行婚”转变为“对偶婚”，女系氏族转变为男系氏族及由此产生的宗法制度等等关键问题的分析，多有启迪。

《秦汉史》 此书通过对社会各阶层如豪强、奴客、门生、

部曲、游侠等进行重点分析探讨，得出就社会组织而言，新莽和东汉之间是一大界线的论点。对诸如豪富的生活、学校兴起、选举制度、衣食住行以及埋葬的风俗，都叙述得丰富多采。

《两晋南北朝史》 此书给史学界作出两大贡献，一是把中国古代史上最错综复杂的一段历史，整理得脉络分明，井井有条；二是对当时社会历史曲折前进的过程，作了详尽的分析。这部史书篇幅最大，达一百一十万字。

《隋唐五代史》 此书写作达十年之久，为了阐明盛唐经济的繁荣昌盛，搜辑了大量史料进行综合叙述，如认为荆扬二州农业发展，使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为了阐明唐代政治制度方面的成就，对政体、封建、官制、选举、赋税、兵制作了细密的分析。对封建君主的分析也有分寸，认为唐太宗有“勤于听政，容受直言”，“渴于求贤，破格任用”的一面，又有“骄暴之习”、“侈靡之心”和“好大喜功”的另一面。“贞观之治”虽有成绩，但史书中描述“太平”景象难免有夸辞。

《中国民族史》 此书分别探索了境内十二个民族的源流，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有南北两派之分，汉族居中，与南派矛盾较缓和，因而融合较慢，与北派矛盾尖锐激烈，因而融合也快，确能“比合史实，发见前人所未知之事实。”

《先秦学术概论》和《理学纲要》两书。前者着重分析各学派源流、相互关系和重要著作。在论述《尉繚子》、《六韬》两书时，认为“此书义精文古，决非后人所能伪为”，否认了近人认为是伪书的结论。近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两书的残简，足证其论断正确。论述对象除道、儒、法、名、墨、阴阳六家外，兼及纵横家、兵家、农家、数术、方技、小说家、杂家，因此自有特色。后者除了说明理学源流外，重点分析了十多个理学大家的哲理。

《吕思勉读史札记》 汇编了《燕石札记》、《燕石续札》

和未曾发表过的读史札记共五百廿六篇，独立识见和探索精神通篇可见。

这些史著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享誉全国，专家学者多有评论。同邑徐哲东教授说：“先生识大而不遗细，泛观而会其通，务求是而不囿于成说，尚核实亦不涉于烦碎，此其为学之方也。达人情、明时变、故善言经世，洞幽颐、晰条理、故善循例，平心气、审名理、故善于评论，此其为学之绩也。于群经小学诸史百家靡不究贯，亦取异域之说相检度，此其为学之区域也。执德契于道，立行依于儒，而言治则尚法，此其为学之要归也。吾观其所著书，宏雅似顾亭林，渊博似钱晓征，论证似戴东原，辩达似章实斋，而其所言者又皆出于一己之独得，虽吾乡乾嘉群彦能如此者亦鲜矣。”他在1944年7月8日复陈研因、徐哲东信中说：“哲兄赐弟寿序过蒙奖借，虽非弟所克当，而无一语非弟所薪向，可谓知我者矣。”

难能可贵的是，先生虽自称是个专门读书的人，但他历来反对死读书。他认为读书不能脱离实际，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社会科学家要努力发掘现实社会的种种不足之处。“对于现状，觉得不满”，于是“要求改革”“要想法子”“然后要研究学问。”他非常鄙视那些“求个苟安，或者捞摸些好处”的读书人。

他认定社会必须改革。对因改革而引起的一些问题的分析也非常中肯。他说，“……社会是需要改革的，然其改革却极不易。所希望的目的未曾达到，因改革而来的痛苦，倒不知凡几了。人们当此之际，就要嚣然不宁。此时之所当务，乃在考察这件事情，究竟需要改革与否？如其必须改革，则这种痛苦，只是改革方法不善所引起，我们该竭力改良其方法，而改革之事，决不可以因之中止。”

“一片冰心”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29日常州沦陷。当时他对女儿吕翼仁说：“我已年过半百，大半辈子过去了，决不向日本人低头！”

他关心祖国的前途，热切盼望抗日战争早日取得胜利。他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40年9月18日在上海孤岛上完成的《吕著中国通史》，是为适应大学文科学习通史的需要而编写的一部特殊体例的著作。上册对史书上零星无系统记载的典章制度，如婚姻、族制、阶级、财产等分成十八个专题，作出概括而又系统的叙述，来反映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趋势，使初学者得到文化史的系统知识；下册则按历史顺序有条理地叙述政治历史变革。直言不讳，他的写作目的，在于搜求以往史实，以说明现在。通过对经济制度和社会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以及中国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趋势。现该书将由华东师大出版社重新排印出版。

此书开卷就说明宗旨：“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在书中启示读者，对中国的前途应充满信心。他说：“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自信心，岂有数万万人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而没有前途之理？”其次启示我们，只有坚持抗战才有出路。“中国既处于今日之世界，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决无可以自存之理。”他认为无论在经济上、文化上，只有解除外力的压迫，才有生息和自由发展的余地。还引用梁启超翻译英国大文豪拜伦的诗作为全书的结束语，“如此好山河，也应有自由回照……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

奴为隶，今生便了。”表达了对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念。

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公共租界，孤岛沦陷，各大学次第停办，光华大学沪校也暂时停办。光华大学的十五位同学得知先生和另一位号称晚清江南四大诗人之一的金松岑教授回乡的消息，于当年除夕晚上相聚在十六铺一家酒楼饯送这两位深受同学尊敬的师长。席间，相互勉励，坚守节操，共赴国难。席后，合影留念。先生在照片右上角写上了“一片冰心”四个掷地有声的大字。

1942年，日本侵略军为了控制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准备发放“良民证”，并让每个领证人都要捺手印，他无比愤慨，决定不做这等有辱国格人格的事。此时，常州乡间游击区正在筹办中学。于是，他到常州南乡湖塘桥青云中学高中部和坂上镇大刘寺辅华中学执教，开设了《国学概论》、《中国文化史》、《中国近代史》、《本国史》、《国文》等课程，每周授课近二十课时。其时，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他疲惫不堪，大病了一场。一年后，便辞去两校教职，回常州专事撰述《两晋南北朝史》，藉稿费度日。

他虽然生活清苦，但是立身持正，志节凛然。在常州期间，城门口的日本兵虽撤，不必再行鞠躬礼，但有的地方仍有日本兵的岗哨，行人经过时还要脱帽，他“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复乃戴帽。”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光华大学复校，翌年他特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戴上，扬眉吐气，昂然归故乡。

学术思想不断前进

吕思勉先生认为，“予之思想，凡经三大变”。“成童时，最信康梁之说。”认为“世界愈变必愈善，既愈变而愈善，则必至于大同而后已。至于大同世界究系如何情状？当由何途以赴之？余时年少，不知考虑也。”这是第一变；十七岁以后，服膺

法家中的术家，主张通过改革政治而走向大同，这是第二变；四十七岁以后，读马克思主义之书稍多，“于此主义，深为服膺”，这是第三变。其实，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先生就略有接触，虽尚未进行深入研究，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已在史著中有所反映。1923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中，论述“社会上的形形色式一切都归结到经济上的一个原因”时，就指出，这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又指出“贵族阶级的崩坏，其原因仍在贵族社会的自身”的时候，认为“这个很可以同马克思的历史观互相发明。”抗战以后，先生读了较多的社会主义书刊，认为治史应包括搜求以往的史实，加以解释，用以说明现社会，因以推测未来，而指出我们进行的途径。然以往的历史都未能担起这个任务，原因就是太偏重政治。他说：“翻开二十五史一看，所记的全是些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因此，他对有些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的家谱，“不能谓其全无理由”。他经常在课堂上说，衣食住行是人生最切要的事情，读某一时代的历史，如果对它的经济情况，不能知道一个大概，读史又有什么用呢？他要求学生在读《通鉴》时，要系统学习《文献通考》中关于经济、文化、兵制等卷。

他一贯重视社会经济现象，早在二十余岁时，即从考察社会现象，关心人民生活疾苦出发，有意作币价考，辑了“以正史为主，间以他书辅之，报纸所载，听睹所及”的不少史料。《四史中的谷价》和《汉人訾产杂论》二文也说明了论述社会经济部分在先生的著作中占有重大的比例。在以后所著的各种通史、断代史、专史中更是在浩繁卷帙中，竭力把各朝代的社会经济史料系统地钩稽出来，并把它们作为社会基础进行阐述，成为先生史著的一大特色。当时有人评论：“他讲解历史着重文化，而言文化处处以社会科学为根据，他承认经济是历史的基础，谓政治只是表面的事情，而今日史学界，有新的知识和深切的见解，而兼

有充实的中国史学问的，吕先生可说是可数的了。”

在1941年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中，他认为各个朝代社会改革都是失败的，其根本原因是“治者和被治者，是两个对立的阶级”，“政治上的治者阶级，便是经济上的压迫阶级，总是想榨取被治阶级，即经济上的被压迫阶级以牟利的。”因此，历代改革者“不知道领导被压迫者，以图革命”。而想要统治阶级中最上级的少数人来为被治者谋幸福，只是“缘木求鱼”。因此，必然失败。这是一种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社会科学上的定律，决不会有例外。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他说：“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

由于他在长期的治史实践中，对唯物史观逐步加深理解，对其学说的创始人也有了新的认识。1943年他在《再示荣女（癸未）》诗中，表达了对马克思的崇敬心情。“圣哉马克思，观变识始终。藏往以知来，远瞩若数计。鸟飞足准绳，周道俯如砥。愚夫执偏端，诤诘若梦寐。庶几竭吾才，靖献思利济。太平为世开，绝业为圣继。……”他在1945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法》中，对马克思主义以经济为社会基础的观点表示了赞赏的态度。他说：“马克思主义以经济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它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他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工作，先后担任过光华大学工会主席，江苏省政协委员。同时，他还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回顾总结，不断地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前进。

1954年6月撰成的《中国史籍读法》，是他治史五十年后留下的最后一部历史著作。书中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观鉴社会变迁，因以发明其发展之由，推测其前进方向。从中可见，随

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他的学术思想也随之不断前进。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疾病缠绵四年之久，仍抱病著作。病逝前两年尚撰《燕石续札》，校《隋唐五代史》，修订《文字学四种》。还给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校阅讲义，代孟宪承校长查考有关研究中国教育史资料。直至1957年9月27日才将增订《字例略说》之最后一篇《文字之改革》脱稿，10月4日至8日仍在校阅《隋唐五代史》，10月9日晚上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遗憾的是先生用力十年之久的最后一部巨著，未能看到它的出版，就悄悄地走了，先生可谓尽瘁于学术矣。

吕先生的著作融会古今，博大精深。为了适应史学家深入开展研究的需要，其全部著作已汇编成总集《吕思勉史学论著》，陆续出版。他的著作在海外亦广泛流传，有深远影响。鉴于先生的道德文章和尽瘁于祖国学术事业的献身精神，其故居已被列入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人们将永远纪念他。

作者工作单位：江苏省常州市政协办公室

《词综·发凡》标点一误

中华书局影印本《词综》，系据汪森等增补的最早本子裘杼楼刊本断句。内有朱彝尊《词综发凡》第十页中云：“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此宋人选词多以雅为目法。秀道人语涪翁曰：作艳词当坠犁舌地狱。”此处断句当在“以雅为目”之“目”字后。法秀道人是僧人法名。毛德琦《庐山志》卷6页22云：“法秀禅师姓鲁氏，云门宗，住栖贤……又谓黄庭坚曰：‘汝以艳辞动天下淫心，正恐生泥犁中。’丛林中号为秀铁面。”

“以雅为目”，即以雅作标准来品评。《后汉书·许邵传》：“曹操微时，常卑辞厚薄，求为己目。”为己目，即为自己品评。《发凡》断句在“法”字后，则两相妨碍。

· 胡迎建 ·